

张志强

展现悠久的历史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历史

——评《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

摘要 肖东发的新著《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在广泛吸收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图书印刷文化做了系统概括和总结,理清了中国印刷术发明的脉络,进一步论证了是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该书反映了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研究的最新成就。

关键词 中国 出版史 印刷史 书评

分类号 G239.29

ABSTRACT *Treatise on the History of Book Publishing and Printing in China* by Prof. Xiao Dongfa includes the latest results in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book publishing and printing in China. It makes a summary of the culture of Chinese book printing, clarifies the history of innovation of typography and confirms that typography was invented by Chinese people.

KEY WORDS China. Publishing history. Printing history. Book review.

CLASS NUMBER G239.29

1984年,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为钱存训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纸与印刷》分册所作的《序》中说:“我以为在全部人类文明中没有比造纸史和印刷史更加重要的了。”确实,无论是17世纪的培根还是19世纪的马克思,都对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给过很高评价,认为它们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在我国,对中国造纸史和印刷史的研究是在20世纪才得到重视的,并且出版了一系列著作。造纸、印刷是中国的伟大发明,一直受到世界各国公认。然而,20世纪下半叶,围绕韩国出土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印刷术由中国发明这一早已得到公认的事实,却被韩国部分学者否认。虽然各国的专家学者都认为韩国出土的这一印本源自中国,但争论却在继续。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大学肖东发教授所著《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版)一书的出版,更具有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1 理清了中国印刷术发明的脉络,再一次维护了中国作为印刷术发明国的地位

肖东发教授长期在北京大学从事中国图书史的研究,出版过《中国图书》、《中国编辑出版史》等著作。1999年10月,在赴韩国出席了“世界印刷文化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围绕印刷术发明权之争等问题,肖东发先生立志写一部全面反映印刷术起源和发展的著作。在被聘为新闻出版署和国家文物局等单位联合组成的“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展研究”课题组成员后,更是加快了撰写本书的进度。该书被列为向2001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第7届世界印刷大会献礼图书。

《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紧紧围绕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这一主题,对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进行了阐述。全书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对20世纪的图书出版印刷

研究进行评述,为全书奠定了一个学术研究背景。第二部分“源流篇”,在考证出版印刷产生的几个必要条件后,就雕板印刷、活字印刷、套版印刷的起源与发展进行论证,理清了中国印刷术产生和发展的脉络。第三部分“系统篇”,就印刷术在图书出版中的应用进行了详细介绍,介绍了官方刻书、私家刻书、佛教寺院刻书、书院刻书等的发展历史。第四部分是“流布篇”,对中国印刷术的外传、中国图书文化的总体特点及其对现代化的影响进行了论述。全书各部分之间互相呼应,对中国图书出版印刷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清理。

印刷术到底是何国发明的?本书对此进行了毫不含糊的回答:是中国人发明的。印刷术的发明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它需要合适的社会环境、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中国隋唐时期,文明高度发达。一直到15世纪结束以前,中国典籍“数量的庞大”、“传播的广泛”和“记录的详细”,“都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钱存训语)。这是印刷术产生的社会必要条件。隋唐时期佛教的兴盛,对佛教典籍的大量需求,是印刷术产生的社会背景。正是社会有图书复制的需要,才会推动印刷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据最新考古发现,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初年,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纸。东汉时的蔡伦对造纸技术进行改造,制造了更高质量的纸张,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中国的捶拓、印章与佛像模印等技术,直接启发了印刷术的产生。因此,只有中国才同时具备印刷术产生的社会环境、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该书在“源流篇”中对印刷术产生的需要与可能的分析,无可辩驳地说明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明国。

由于岁月的流逝,要找到最早的印刷品无异比登天还难。现存标有明确印刷于唐咸通九年(868年)的《金刚经》,刀法纯熟,印刷精美,学术界普遍认为它绝非印刷术发明初期的作品。近年来在陕西、安徽、江苏等地陆续发现的《陀罗

尼经》,印制的年代均为唐代,只是确切年代均不可考。1966年10月在韩国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经卷本身没有刻印的年代和地点,但据潘吉星、李致忠等人考证,认为是唐代长安元年~四年(701~704年)的洛阳刻本。《陀罗尼经》在中国的陆续发现,以及韩国发现的刻本中有武则天称帝时颁行并通用的4个制字的事实,说明该印本乃是在中国刊刻后传到韩国,并不能说明韩国发明了印刷术。该书对这些情况均作了详细介绍,对了解印刷术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印刷术到底发明于何时?学术界历来有“东汉说”、“晋代说”、“隋代说”、“唐代说”、“五代说”等多种提法。前三种提法,由于举证困难,难以令人相信;“五代说”则因已发现唐代印刷品实物所否定。目前争论的焦点是“隋代说”和“唐代说”。“唐代说”因已有印刷品实物支撑,关键是确切的时间。而“隋代说”只有文献记载,缺少实物。肖东发认为:“在肯定我国唐代初年已有雕版印刷品流行的前提下,亦不能完全否认隋代出现雕版印刷术的可能。尽管目前还缺乏有力的实物遗存和文献的佐证,但有理由认为由捶拓和印章的结合,向印刷的过渡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这一论断,不只是关系到印刷术的发明时间,还涉及尽快结束印刷术的发明国之争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途径,就是考古中发现新的印刷品实物。看来,要彻底解决印刷术发明国之争,还有一些工作要做。

2 吸收了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研究的最新成就

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出版本书时约请的出版印刷史专家所作的“审读意见”中说:“《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代表了我国出版印刷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水平是一流的,可以代表国家在国际学术论坛上占有席位。这部书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开创未来,继续攀登印刷技术高峰,繁荣出版事业,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确实,作为反映我国出版印刷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该书广泛吸收了考古界的最新发现、出版印刷史界的最新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论述。除前面提到的在涉及中国印刷术的起源这一问题时,广泛吸收了近年考古界的最新发现,以及潘吉星、李致忠等人对韩国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研究成果外,书中其他地方同样如此。如套版印刷术中的短版和拱花技术,传统的说法是短版和拱花技术发明于明代。荣宝斋古书画修复与装裱专家冯鹏生先生在《中国木版水印概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以大量文献和实物证据,得出了拱花始于唐、短版肇自宋的结论。肖东发先生在本书中就吸收了这一观点。再如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及其流传。由于宋元时期的活字印刷品目前尚无实物发现,尤其是中国活字印刷术如何传到西方、影响西方的,这也是出版印刷史中的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史金波、雅森·吾守尔先生所著的《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流传: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对发现的西夏和回鹘活字实物,以及活字印刷流传西方的路线进行了考证,理清了中国活字印刷发

明、发展和西传的脉络。这一研究成果也被吸收到《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中。该书在此基础上,理出了从毕昇泥活字(1041~1048)—沈括知延州(1080~1082)—西夏文活字(1160~1237)—回鹘木活字(1300前后)—欧洲木版宗教画和木制活字(1375~1426)—谷登堡金属活字(1438~1450)的流传线索,再次说明古登堡的金属活字是在中国活字印刷基础上形成的,同时也维护了中国作为活字印刷术发明国的地位。

3 对中国图书出版印刷文化进行了概括和总结

研究中国图书出版印刷文化的目的是知古鉴今。肖东发教授在该书最后专辟一章《对中国图书出版印刷文化的思考》。在该章中,作者总结了中国图书出版印刷文化的成绩,从10个方面对这些成绩作了阐述。这10个方面是:“中国是文字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而且一脉相承,从未中断”;“中国是出版印刷事业最先发达最早普及的国家”;“中国是图书文献载体材料众多,最先发明印刷术的国家”;“中国是最先发明印刷术,包括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套版印刷三种技术的国家,这些发明的作用无可限量”;“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典籍最多,图书类型最丰富的国家”;“中国书籍既注重实用,又注意美观,讲究装帧设计,很早就有了成形的书籍制度,而且不断发展演变”;“中国是最重视藏书的国家之一,古代公私藏书刻书在图书保护方面作出了不朽贡献”;“中国很早就建立图书编纂机构和出版管理制度,编纂了许多部可称为世界之最的巨帙大书”;“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图书发行的历史,很早就出现了书业广告、稿酬、版权意识”;“中国的版本、辨伪、辑佚、校勘、目录等治学之学发达,硕果累累”。这些概括,切中肯綮,较好地概括了中国图书出版印刷文化的特点。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了中国图书出版印刷文化的五大缺憾:“图书经营管理上,尽管我国起步很早,但始终没有形成规模和制度”;“在图书内容上,尽管类型丰富,但忽视了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发展”;“在图书保护上,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对不利于巩固封建统治的文化典籍实行遏制和禁毁,致使我国图书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在著述方式上,编纂注疏等形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不重视知识创新”;“在图书流通上,中国古代公私藏书楼重藏不重用,将收集来的图书束之高阁,有如禁锢,与图书传播知识文化的职能大相径庭”。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就中国传统图书出版印刷文化对出版业、对科学技术、对学术研究和学风、对图书馆事业的影响作了具体分析,认为在今天还能看到它们的负面影响。这些内容,对今天的图书文化建设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为了更加形象地说明中国图书出版印刷文化的发展历程,作者为该书选配了彩图29幅、黑白图69幅。这些有代表性的图片,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明国,中国的图书出版印刷史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葩。

张志强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兼任南京大学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通讯地址: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邮编210093。(来稿时间:2001-08-24)